

1957—1958年美国

经济危机的成因与启示

□ 王丽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一段平稳快速发展期，这让西方经济学界一度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终结。然而，1957—1958年发端于美国进而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将“黄金年代”的浮华撕开一道裂口，为20世纪70年代普遍而长期的“滞胀”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预演，同时也埋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的重要伏笔。

生产过剩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

1955年至1957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掀起一轮投资高潮，重工业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推动了固定资本投资。表面的经济繁荣催生了大量金融泡沫进而孕育了新一轮经济衰退。1957年3月，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率先在美国爆发。

从1957年3月起，美国出现商品滞销、库存增长、工业生产下降等现象，尤其是与日本、德国存在激烈竞争的钢铁和汽车等部门，生产量更是下降一半以上。1958年第三季度，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同比下降15.6%，失业率上升7.5%，出口总值下降了14.3%。作为当时GDP占世界总量40%以上的超级大国，其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必然发生外溢，日本、加拿大、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等紧随其后相继卷入危机。依据对美国出口依赖程度的不同，各国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日本受危机影响最深、持续时间较长，历时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0.4%，物价指数下降7.4%。英国次之，持续了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3.7%。西德持续时间较短，仅仅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4%。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先摆脱经济危机的国家。

1957—1958年经济危机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特征，即物价上涨、经济下行，消费品价格上

涨、生产资料价格下行。美国继续沿用凯恩斯主义治理危机，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政府干预，情况曾一度好转，但很快又跌入1960年至1961年的小型危机中。这次小型危机是1957—1958年危机的余震，美国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此后，又发生了数轮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美元信誉严重受损，在全球遭遇围剿，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也陷入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

危机爆发原因

美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削弱了国际竞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稳住欧洲、更好地遏制苏联扩张，美国于1947年推出马歇尔计划以投资欧洲重建。同时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以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成为美国军火供应商，进一步拉动了经济复苏。此时的美国则由于军费长期高企、工资和汇率较高、产品出口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在相对下降，逐渐失去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国际收支逆差、大量黄金外流助推危机爆发。1957—1958年经济危机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国际经济良性循环阶段。但是，在良性循环中各国的收益却并不平衡。日本和西德工资低，货币定值低，随着投资不断扩大，其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而此时的美国经济增长率只有德、日的一半左右，贸易顺差不断缩小，加上资本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导致1958年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33.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引发大量黄金外流，对外经济实力和美元信誉进一步削弱。

凯恩斯主义理论失效进一步深化了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沿用凯恩斯主义，放弃传统“自由放任”的政策，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刺激需求。但是1957—1958年经济危机已经呈现“滞胀”特征，凯恩斯主义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余震，遇到了无法兼治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两难困境。而美国政府硬性套用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化，政策空间越发狭窄，为爆发更大规模、持续更久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滞胀”便是明证。

启示

1957—195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这一历史事件给世人敲响警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应对经济周期波动。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验证了宏观经济调控对于驾驭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性。宏观经济调控对策可以从两个关键方面着手。一方面，财政政策应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通过适时调整税率、发放补贴、增加公共项目投资等手段，既降低企业和居民负担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又着眼于长期发展，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需灵活适应经济形势变化。国家适时调整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关键参数，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强化对金融市场的监测、监管和预



(上接1版)按照“由专而全、由内而外、上下协同”的思路，探索构建监督体系，以加强“四项监督”统筹衔接为重点，着力健全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体系，以反腐败协调小组、巡回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为抓手，积极协助党委落实全面监督责任，通过“两个责任”贯通协同促进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实现监督经常性、常态化、全覆盖、有效性，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从严正风反腐为“走在前、做示范”清障碍

腐败和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危害经济健康发展，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拦路虎”“绊脚石”。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要立足职能职责，多向发力、综合施策，消除一切阻碍制度执行、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消极因素，更好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

坚定不移防风险。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前哨”，在长期高速发展中也积累了一些风险隐患。风险隐患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和作风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一体履行协助职责和监督专责，要不断提高发现风险、认识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本领，紧盯政治、经济、社会风

险，精准查办政府债务、平台公司、国有资产、政府投资基金等重点领域案件，全力追赃挽损，推动落实责任。可以通过高水平监督、高质量办案，及时精准“拆弹排雷”，让监督监管跑在风险前面，为“走在前、做示范”系牢安全带、装好保险阀。

标本兼治促改革。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腐败分子之所以敢任性用权、肆意妄为，主要原因就在于权力配置不科学、运行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全周期管理”方式一体推进“三不腐”，交好移送司法机关和深化以案促改“两张答卷”，特别是在标本兼治上聚力用劲，抓住典型“解剖麻雀”。围绕定政策、作决策、审批准管等关键权力，深入查找权力出轨越轨的根源和症结，既督促办案单位对症下药、靶向整改，又推动整个系统举一反三、源头治理，通过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铲土壤、去条件，更加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让胆敢逾矩者无机可乘。

用心用情惠民生。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走在前、做示范”，说到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纪检监察工作是人心工作、群众工作，要顺应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突出问题导向，做到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坚决纠正。重点聚焦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整而未治、禁而不绝的行业乱

象，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聚焦惠民政策落实、基层权力运行、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等，整合县乡监督力量设立协作区，整合村级监督力量建立联络站，构建县乡村三级监督“贯通体”，切实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

突出严管厚爱为“走在前、做示范”聚合合力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凝聚团结奋斗的广泛力量，着力把自我革命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成效。

匡正干事创业导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干部政绩观问题，2023年3月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7月在江苏考察时再次强调，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从严管理监督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严肃规范精准慎重问责，深入整治“政绩工程”、“新形象工程”、数据造假等问题，完善细化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惩戒机制，推动党员干部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干事创业。

激发担当作为动力。干部的精神状态、工作状态，直接决定着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落实“走在前、做示范”重大要求，离不开一

警，重点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构建抵御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的宏观调控体系。

适时结构转型以保障经济韧性。1957—1958年经济危机中，美国曾经的优势产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渐处劣势。这说明，依据国际产业竞争的总体态势适度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以增强经济韧性意义重大。经济转型的本质是通过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实现结构升级以保持竞争力。其一，以创新引领技术和产业升级。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通过构建企业升级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在产品多样性与技术复杂性等维度上综合提升生产能力。其二，做大做强产业链以增强经济韧性。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整体产业链水平，保持处于世界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上游位置，这对保护本国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建构国际合作机制共御经济风险。面对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应构建共同防控危机的国际合作长效机制。一是建立危机防控的协同预警机制。经济危机存在一定的规律可循。危机爆发前一定会有征兆性因素的出现。通过敏锐及时捕捉这些信息，加以科学分析并采取有效举措，就能对危机进行提前预判并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把损失降到最低。二是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协同治理机制。互相通报经济波动讯息、危机进展情况以及应对危机举措，及时、恰当和全面地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各国之间高效协同共同预防危机，有效应对危机以及危机后重建的相关基础性工作，为共御风险、共渡难关提供机制保障。

法国现有社会组织约40万个，且种类繁多、领域广泛、规模不一。为了保障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法国政府构建了一套兼顾规范性与灵活性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法国是如何管理社会组织的呢？

严密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法国拥有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专对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其中，《协会法》作为核心法规，规定了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设立程序、组织架构、决策机制、财务管理、信息公开、变更与解散等关键要素。《民法典》作为基础性法律，其法人制度、合同法、财产法等相关条款，为社会组织确立法律人格、明确成员权利义务、规范对外合作等提供了基本依据。除此之外，还有多个专项法规如《非营利社团管理法》等。这些法律法规涉及社会组织法律地位、设立程序、内部治理、公益目标、劳动关系的方方面面和诸多细节，构建了法国社会组织运作的法律环境。如在名称登记阶段，法律法规详细规定了社会组织申请名称登记所需条件、程序，要求社会组织名称准确反映其非营利性质、特定领域或行业，保持唯一性，避免与已注册组织名称相同或相似，禁止使用可能误导公众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词汇，确保名称合法、清晰且易于辨识。

逐级展开的伞状组织结构。法国社会组织体系呈现出一定的伞状结构特征，逐级展开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层级关系和相互作用上。法国中央政府制定了总体的法律框架和政策指导，如同伞柄，对整个社会组织领域起到支撑和引领的作用。基层社会组织，如协会、基金会、合作社等，如同伞骨末端分支，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社会组织根据各自目标和章程自主运作，参与到社区服务、公民权益维护、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级的行业协会、联合会等中间层级的伞状结构组织，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任务及协调、整合和指导下属各类社会组织的工作，形成有序的社会组织网络。此外，一些大型社会服务机构，也会通过垂直管理和横向联合的方式，形成类似于伞状的多层次管理结构，下辖多个分支机构和成员组织，实现资源共享和行动协同。

多方参与式的治理模式。法国社会组织普遍实行参与式治理模式，强调民主决策、透明运作和全员参与。首先，从组织内部层面看，成员参与贯穿决策全过程，每一位成员均享有实质性的话语权，他们参与制定和修订组织章程，选举领导者，并就重大议题进行投票决策，确保组织行动与成员意愿和社区需求紧密契合。如法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协作的顶层设计机构是国家发展与国际团结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际合作与发展部于2013年成立，包括总统代表、总理以及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的部长和开发署署长等共50多人，此外还有来自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每年召开三次会议。其次，扩展至组织外部关系层面，参与式治理强调与包括政府、企业和社区在内的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通过组织各种公开论坛、研讨活动，鼓励各方共同探讨、策划项目，形成广泛共识与协同效应。最后，在透明度与决策机制方面，法国社会组织积极推动信息公开，定期公布各项活动与财务报告，确保组织运行透明化，重大决策经由协商机制达成，尊重并吸纳各方意见，旨在寻找最大程度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案。通过这三个层次的贯彻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模式在法国成功地提升了社会组织的代表性、公正性和效率，有力促进了社会健康发展。

丰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法国积极倡导和支持社会组织拓宽筹资渠道，实现资金来源多样化多元化。首先，从内部筹措角度看，法

法国如何管理社会组织

□ 张燕红

国社会组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吸引和保留会员、收取会费作为基本的资金来源之一。同时，组织内部开展各类活动和服务创造收益，如教育培训、咨询服务、出版物销售等，以实现自我造血功能。其次，外部援助和资助层次上，法国政府积极引导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政社分开、政府职能转移、政府购买服务、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等政策工具，都是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扶持的重要手段。此外，法国的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和私人慈善家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他们通过捐赠、赞助或建立合作关系，为社会组织注入大量资金。最后，在国际化与跨界合作层次上，法国社会组织积极拓展国际视野，寻求国际合作项目资金，同时对接跨国企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引入海外捐赠和援助款项。

科学严谨的监督评估机制。法国建立了科学严谨的监督评估机制，对社会组织的运作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监控与评价。一方面，国家和地方行政部门担任主导角色，设有专门机构对社会组织进行行政监管。社会组织须定期向相关部门提交运营报告和财务数据，接受对其合法性、透明度的深度审查。政府还会运用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考察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效能、项目执行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这些评估结果直接影响着政府的资源配置、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第三方评估体系也占据重要地位，独立的评估机构、审计公司及学术研究团体通过对社会组织实际成效、社会效益和创新实践等方面的深度剖析，提供公正、客观的评估报告。这些报告不仅能帮助社会组织识别自身的优缺点，也会成为政府、捐赠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决策的重要依据。此外，社会组织内部自我监督机制同样不可或缺，通过设立监事会、独立董事或内部审计机制，确保组织活动严格遵守章程，财务运作透明，决策过程公平公正。与此同时，法国也十分重视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推行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政策，让公众能够全面了解社会组织的运营实况和项目成果，并通过举行听证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

